

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革命

[美] 阿道夫·貝利著

內部讀物

商務印書館

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革命

〔美〕阿道夫·貝利著

鍾 遠 蕃 譯

內 部 讀 物

商 務 印 書 館

1981年·北京

Adolf A. Berle, Jr.
THE 20TH CENTURY
CAPITALIST REVOLUTION
Harcourt, Brace & Co.
New York, 1954

内部读物(甲类)

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
〔美〕阿道夫·贝利著 钟远蕃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107号)

崇文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 4617·32

1961年6月初版

开本 850×1168¹/₃₂

196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84千字

印张 3⁸/₁₆

印数 1—2,500册

定价(9)0.50元

701 02/04
譯 序

本书作者貝利是美国壟断資本主义的辯護士，是鼓吹所謂“人民資本主义”、“新資本主义”的头面人物。

“人民資本主义”、“新資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日益沒落、社会主义陣营日益强大、馬克思列宁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的形势下，資产階級辯護士为了挽救資本主义的灭亡而捏造出来的一套謬論。这套謬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盛行于美国和西德。在貝利的这本小册子里，它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貝利在这本小册子里說，由于大股份公司的发展，美国的資本主义发生了“革命”，它和“旧”的資本主义已經截然不同。“1954年的資本主义和1854年的資本主义，只不过有依稀相似之处，和1804年的資本主义相比，簡直就沒有什么真正的共同之点了。”他断定，这种“新資本主义”或“公司資本主义”是一种类似社会主义的計划經濟，它使得資本主义經濟的“不穩定性和危机变得逐漸可以控制，而且肯定地是比任何与之相匹敌的制度所固有的政治上的不穩定性和危机更加可以控制。”这种“計划經濟”活动的目的，据說不是为了追求壟断利潤，而是为全体人民“服务”，因为大公司和經理們虽然掌握着“絕对的权力”，但是由于政府的干預和輿論压力等等，他們并不能够任意行使这种权力，而必須从公司“顧客”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出发。

这种謬論的反动意图是十分明显的。既然美国的資本主义已經发生了“革命”，开拓了有計划地迅速发展的道路，使得全体人民都能享受美好的生活，那么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对立等等当然也就不存在了，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成了完全多余的东西，对于无产

階級和劳动人民來說，現在重要的是如何建立和加强“階級合作”，好使資本主義社会永世長存。

謊言当然掩盖不了事实。帝国主义辯護士和一切为帝国主义豢养的走卒們精心編制的各种維護壟斷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在現實面前总是碰得头破血流。貝利所說的“新資本主義”，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或壟斷資本主義，美国的大公司資本主義，就是最典型的壟斷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就是病入膏肓的資本主義。如果硬要說“新資本主義”与“旧”資本主義有什么轉變的話，情况就是如此。壟斷組織的統治，不但沒有廢除資本主義的剝削，而且由于它操纵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經濟實力，它对于國內劳动人民的榨取和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是更加强化了。在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下，国家政权日益从屬於壟斷組織，所謂政府的“干預”，其实就是一小撮壟斷組織的代理人按照他們主子的利益和要求办事而已，把这种“干預”竟然說成是迫使大公司为人民“服务”的手段，这是弥天大謊。至于“輿論压力”云云，这更是資本主義民主騙人的傳統把戏。在一切宣傳工具由壟斷組織操纵的情况下，所謂“輿論”正是壟斷集团为了本身利益而制造出来的。人民的正义呼声則遭到殘暴的压制，而且退一步說，即使某些进步輿論能够冲出法西斯的压制，又如何据此就能改变壟斷資本主義的性质呢？这不过是帝国主义辯護士麻痹人民群众革命意志，轉移斗争視綫的一种鬼蜮伎倆。

在帝国主义阶段，壟斷代替自由竞争占据了統治的地位，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从自由竞争生长起来的壟斷并不消灭竞争，而是駕凌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許多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因此，貝利所吹噓的公司資本主義、卡特尔制度根本不可能消除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实现資本主義經濟的有計劃的发展。相反地，在股份公司制度下，資本主義生产更加高度

地社会化，而生产資料則日益集中在一小撮壟斷資本家的手里，这就使資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資料的資本主义所有制的矛盾愈趋尖銳，这种矛盾的表现，也就是生产和消費的矛盾日益激烈，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日益加剧，經濟危机的周期日益縮短。美国資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短的十多年間已經经历了三次經濟危机(1948—1949年、1953—1954年、1957—1958年)，目前又进入了破坏性更加猛烈的新的經濟危机。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要导致阶级斗争日趋尖銳，尽管貝利把所謂“二十世紀的資本主义革命”說得怎样天花乱墜，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无可避免地要落在壟斷統治的头上。

对于帝国主义形形色色的辯護士的这套謬論，我們必須加以坚决的駁斥。“人民資本主义”之所以值得我們注意，这不但是因为它在美国、西德等資本主义国家还有一定的市場，对劳动人民起有欺騙和迷惑作用，而且因为它还是現代修正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南斯拉夫鉄托集团大肆散布的一些謬論，如所謂“典型的資本主义社会制度已經成为过去”，把国家壟斷資本主义說成是社会主义，說什么壟斷資本的国家机器并不为壟斷資本服务，“国家日益監督資本”等等，同“人民資本主义”說客們的主張如出一轍。为了彻底清除現代修正主义的毒素，我們就必须对“人民資本主义”的謬論进行深入的批判。我把这本小册子翻譯出来，目的就在于为学术界提供一本反面教材，以便于开展对“人民資本主义”的謬論的批判。

緒 言

作者于 1954 年曾应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会的邀請，在朱利叶斯·罗森塔尔基金会的主持下作了一系列的讲演。本书是根据那些讲演扩大写成的。当时曾认为，如果就有关现代公司法的问题来作讲题，将会使人感到兴趣；然而，由于哈維格赫斯特院长的亲切的指导，决定试图从新的角度来探討现代公司。

几个世代以来，人們都是把现代公司当作法律团体来进行分析研究的。大約在三十年前，有人曾试图对它作新的研究，即把它当作经济制度来研究。但是現在似乎也应该把它当作准政治制度来探討了。因此，本书就不只是有关法律方面的专门著作，而且是政治学方面的作品。

从法学院教授会以及从紀念朱利叶斯·罗森塔尔而成立的法律研究基金会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要展开爭論的革新。但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会絕未因此而感到不安。现代法学探討法規，也同样探討制度。现代公司是一个新的、典型的美国制度，它属于政治范围之内，也属于商业法范围之内。实际上，现代公司已經成为安排美国经济生活的一种主要机构，它几乎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共和国的組織生活中的一个因素。我想，就是在 1848 年德意志革命以后移居到美国来的老朱利叶斯·罗森塔尔（他是美国工业制度开始形成时芝加哥律师界的大人物）本人也会首先承认，在二十世紀的美国正如在十九世紀的欧洲一样，政治学和法律是紧密地相关联着的。

我希望拙作能起拋磚引玉的作用。本书得以完成，我要向許多人致謝。首先，我要感謝在哥倫比亞法学院公司問題高級研究

班学习的我的学生們，这些青年男女好几年来都从各方面研究了本书只是提出而沒有詳細論述的問題。我要衷心感謝三位已故的教授：哈佛大学的威廉·里普利教授，哥倫比亞大学的休格·杰威教授和韦斯利·克萊尔·密契尔教授。里普利教授原是一位人类学家，后来成了經濟学家。杰威教授是一位大法学家。密契尔是研究制度經濟學全部問題的先驅者。他們三人都鼓勵我从事研究，本书就是我研究的一个成果。

我也要感謝瑪格丽特·普尔女士，当我被別的一些更其紧迫而收获也許更少的事扯去的时候，她努力为我整理各种草稿。

阿道夫·貝利

1954年于紐約哥倫比亞大学

目 录

緒言	5
第一章 現代公司与資本主义的革命	1
第二章 公司权力与現代資本主义	10
第三章 国王与公司的良心	30
第四章 国际事务中的現代公司	60
第五章 公司資本主义与“天城”	86

第一章 現代公司与 資本主义的革命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二十世紀中叶革命的資本主义的一个方面。范围是研究現代公司所产生的某些后果。現代公司这个奇特的組織已經成为既是法律机构，又是經濟組織，既是技术进步突发——我們这一代的显著成就——的媒介物，又是它的主要产物。

目前还没有充分研究二十世紀資本主义的著作。那些博学的評論家都十分清楚，目前流行的一些說法不外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陈腔濫調。

1859年，当拿破侖三世对奥地利作战的时候，据说他曾請教过波拿巴·拿破侖时代的佐米尼老元帅。佐米尼按照1809年的神圣傳統来规划那次战役。但是，正如菲利浦·盖达拉先生尖刻地指出的一样，靠佐米尼的計劃永远不能打败奥地利人。可是奥地利王国却不折不扣地用1759年的战略思想来对付在1859年开始爆发而以1809年的思想来进行的那場战争。自然，法国人打贏了。人們对美国二十世紀資本主义的攻击和人們起来保卫它的情况也頗类似上面所說的法奥战争。对美国二十世紀資本主义的攻击，其长远的淵源要溯自欧洲的社会思潮。大約在1870年左右，卡尔·馬克思的理論使这个社会思潮达到了最高峰，而目前的共产主义理論家們仍然令人煩厌地反复引述。为了对付这种攻击，資本主义的主要捍卫者們不断引述亚当·斯密在1776年所闡述而在1817年为李嘉图所发展到高峰的資本主义理論和說明。看

来还没有一个人认真着手重述一下美国资本主义自从 1930 年(我們姑且这样說)以来的发展的真实情况,描述它的活动和成就,并修正理論以符合实际。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捍卫工作落到了报界人士和公共关系专家們的肩上,而企业界人士却默然无声。美国资本主义的真实任务应该是进行一場有力的反击。

美国资本主义有一切理由来进行这一場反击。它在經濟上总的成就是无比卓越的;把一切因素(包括人类自由)都考虑进去,美国资本主义的收益分配制度已經无可比拟地胜过有史以来的任何制度,虽然还决不是完滿无缺点的。它的进展的速度沒有減緩的迹象。即使是它的不稳定性和危机——馬克思和目前苏联政府指望它們来破坏美国资本主义整个社会机构——也变得逐渐可以控制了,而且肯定地是比任何与之匹敌的制度所固有的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和危机更加可以控制。我們掌握着可以用来进行摧毁性反駁的一切資料。

但是,如果不改变过去的理論方向,就不能利用这些資料。因此,本书将丢掉(有时是很失敬地討論)法学家、經濟学家、商人和广告公司所偏爱的一些神圣的詞句。把 1954 年的美国公司制度說成这样一个制度,即在这个制度內,大单位之間的竞争(这目前是存在的)和成千成万的小生产者之間的竞争(这在美国經濟大部分領域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会产生同样的結果,那当然是不正确的。把被称为公司的大集体企业的活动描繪得和李嘉图时代的个人企业家的有限的私人企业的活动一样,也显然不符合事实。把公司集中的广泛活动說成是“私人的”活动,只会使人誤解——除非它的含义是指这些公司并不是国有的,但甚至这样的含义,从下文討論中可以看出,也值得考虑。在一个以全力創造有計劃的供求平衡而往往获得成就的(例如石油工业和制糖工业目前所实施的)經濟制度下,即使是傳統的供求法則也需要作新的考察。在事

实已经表明公司的活动是遵循着一种逐渐显现出来的社会学的和政治的规律，并且是适合我们时代的各种社会需要的时候，还硬说它主要是遵循着一世纪以前古典经济学家比较确切地表述出来的经济规律，那无疑是荒唐的。

我恐怕我们会绘出一幅同目前许多报纸的金融栏纷纷报道的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制度的特点远不相同的图景。相反地，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比之以往在放任主义的保护下所记载的更加有效、更敏锐和（在作者看来）更令人激动的体制。它的成功中也有失败，优点中也有缺点；伟大的发展前途中也有严重的危险；事实上，一个新时代的偉大创举正在孕育中。

二

二十世紀的上半世紀給西方带来了引人注目的矛盾現象。这个时期在自然科学方面提出了許多假設，其丰富和大胆出乎人們的想象之外。但在经济学或政治学方面却没有产生同样偉大的假設。自然科学已经通过实验阶段而进入实际应用阶段，世界的面貌已经改变。但是，在经济学方面，我们还刚刚开始积累日后建立科学理論可能作为依据的一些法碼和工具。在政治学上，我們簡直是在凭直覺摸索——只有遵循一些經濟学家和哲学家所提出的理論而行动的时候是例外，而这些經濟学家和哲学家中最近的人物也許是 1883 年逝世的卡尔·馬克思和 1896 年逝世的海因里希·馮·特雷契克^①。

这种差別所产生的絕然相反的结果是十分明显的。医学，由于它的成就的应用范围扩大，它已經有可能使所有国家（包括美国）的人口增长趋势发生显著变化。在爱因斯坦和尼尔斯·波耳^②領

① 德国历史学家(1834—1896)。——譯者

② 丹麦物理学家，研究原子和电子，1922 年曾获諾貝尔獎金。——譯者

導下的物理學給舊世界帶來了一個新的境界——包括原子的破壞與可能的創造、從未窺測過的電子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從來未探討過的但顯然可能的各種物質的變化。生活的物質環境正在迅速向令人不可置信的境界變化。如果在 1910 年，有一群人集會宣布他們打算通過內燃機的使用將美國改變成一個用汽車和飛機運輸的國家，並改造房屋建築、商業、農業、運輸和城市的結構以相適應，也許他們會被控以顛覆罪，更可能會被當作是一群瘋子。但這種情況在三十年的時間內確實出現了。如果同時也有一群醫生宣布他們要改革醫學和公共衛生技術，使得人類能夠進行兩次世界戰爭，而主要交戰國的人口仍然能夠不斷地增加，那人們會注意他們的話，但不相信他們。倘若這群醫生還說他們能夠出力改變美國人口增長率，使得美國在 1953 年人口達到一億六千萬，那麼他們除了引起人們的懷疑之外，還會引起人們的憂慮。如果農業植物學家也出來說，他們能夠增加糧食產量到這樣的一個數目，使得糧食問題不是供不應求而是生產過剩，那麼，恐怕只有喜歡詭辯的人才肯去聽。可是這些事情全都實現了。看來，在二十世紀中葉，他們還會預言有更大的變化要來臨。

而在社會科學方面，由於在抽象理論方面缺乏同樣的開拓精神的基础，大部分世界還是憑經驗辦事。管理經濟的方法大体上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整個西方世界盛行儲備銀行時期的那一套辦法。國際政治的方法看來甚至要倒退到十九世紀一般的水平以下很遠；各國關係史在許多方面都是和十六、十七世紀宗教改革戰爭的恐怖歷史不相上下。國家政治組織及其權力，照作者看來是有進步的，但這些進步的獲得，與其說是通過理論分析的应用，不如說是由於實驗與錯誤或偶然的發現。

這種情況說明人們為什麼忧心忡忡。下面的設想是有道理的，即：技術迅速進步，以及（如果威·斯·吳廷斯基博士最近的估

計正确)在今后五十年內世界人口將增加八亿五千万(还不包括在这个时期美国人口可能增加到二亿以上的情况在內),这必然会給我們的組織和管理才能带来一个更加巨大得多的压力。不錯,过去和今后的技术进步都可以証实这个假定:食物、住宅等等的供应將足够滿足需要。但是組織这些东西的供应和分配的任务却將大大增加。最后,人类并不是昆虫,因此,在这个加速发展的制度內,保存他們的个性与尊严將成为头等重要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屬於从前希腊人所謂的“政治学”,或我們今天不十分精确地称呼的“社会科学的范围”之內。但是这门科学現在仍然是一个梦想;它的名称与其說是反映了现实,不如說是表达了一个願望。

二十世紀在这方面的缺陷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釋。也許公正的說法是:缺乏大胆的理論这一事实,使得政治学没有任何被人們所接受的有效的假說,因此也就缺乏任何有效的观察現象的方法。因为除非有某种假說(姑不管其日后的命运如何),否則,就沒有对要加以观察的現象进行选择的基础,也沒有办法記錄这些現象,使这些記載成为分类研究的基础,因之也无法把这些現象联系起来而适当地确定其因果关系。結果,人們就不能找出一些原理,以根据过去的經驗作出关于未来的推断。一个假說即使不好,也会組織人們进行思考和观察,以至断定这个假說是錯誤的。完全沒有假說,就会产生漫无目的地搜集材料的情况,象威·斯·吉尔勃特爵士的“关于斜边开方的一些有趣的事实”一样,当然,所不同的是,我們对于数学上的斜边了解得很多,而对于人类組織却了解得极少。

因此,我們应当把一个相当明确和值得注意的現象——美国大公司——作为政治学的对象来加以研究。公司是人类的組織。它的历史和成效是大致可以指出来的。指导公司活动的大都是常规的法律。大公司至少对于美国經濟的影响的統計图表已經开始

制繪。不論把大公司看作是生产手段、分配工具、就业淵源，还是經濟进步的动力，它在美国的重要性都是明显的。大公司是二十世紀資本主義基本上革命的工具，这种說法或許不会引起爭論（虽然其根据在下面才提出来）；大公司确实是使資本主義演进到早期的經濟理論所梦想不到的境地的一个原因，即使不是主要原因。因此，对大公司加以研究是有益的，也許这个研究会有助于指明方向，使人看出建立有穩固基础的二十世紀的政治理論是可能的。

三

且不說法律上的問題，任何大公司首先是一个机构。如果由于国家的一个法案、法庭的决定或由其他方式，公司突然被剝夺了它所享有的合法地位——比如說，它的執照被吊銷了，那么公司的董事們、职工、顧客、債权人等等将会受到一陣震惊。但人們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反应将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情景，正如一幅著名的漫画里的情景一样——站在大水閘上的一个工人用傳声筒向在水閘下面的一个工人大声說，水閘工程已被宣布为違宪了。但水閘依然屹立在那里；大公司所遭遇的情况也将是这样。很显然，給与这些大公司以維持生命的血液和活动的心臟的不是法律和法律所赋予的法权地位。如果法律通过某种方法宣布公司已不存在，那末人們会发现，这些实体并不是法律上的虚拟，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铁路将照常行駛。邮购商店将继续給顧客装貨。鋼鐵公司将繼續运输矿石并加工炼鋼。属于这些公司的人們照常干他們往常的工作；社会依然指望它們繼續供应。顧客們繼續偿付他們的賬，向这些公司銷貨的人們照常供应貨品。工厂的行政人員照常办公。會計人員在會計檢查員指导下繼續記賬。實驗室仍将繼續进行已开始的实验并計劃新的实验工作。某个律師申訴董事們不应再决定政策或總經理不能再发布命令，将是徒然的。董事們将依

然举行会议并作出决定，总经理仍指望他们决定他的报酬，职工们仍等待总经理的命令。空缺仍然按往常一样递补，不称职的人仍将被辞退。巨大的机器将仍然很好地在运转。这是一个机构所具有的本质，而不是法律所创造的。

二十世纪中一些革命政府对待大公司的态度就是这一事实的显著说明。共产党和法西斯国家曾采取同样的态度对待这些大公司。共产党和法西斯国家根据它们自己的哲学和所宣布的计划，都是决不願意让(美国人所理解的)公司存在下去的。共产党人要把大公司干脆变成政府的机构；法西斯要把它們变成集中的和绝对的独裁政权所控制、但多少是属于私人的机构。但据作者所知，共产党和法西斯政府对待大公司都是极端小心的，它们的第一道命令是要大公司照常营业，下一步是逐渐调派来一些能执行中央政府或其有关机构的命令的人员。在开始的时候，发布这些命令都是极端谨慎的。特别是在法西斯国家，它们曾试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公司的整个机构，国家仅仅保持最后的指挥权、用人权，自然还有征集法西斯政府认为适合的捐税的权利。在意大利法西斯统治二十年和纳粹政权统治十二年以后，公司组织仍完整无缺。共产党国家的手法包括逐渐渗入、教育与控制工作人员，目的要使公司的整个活动终于纳入国家的控制之下。虽然这远比法西斯国家的做法快得多，但共产党国家接收公司的过程还是要经过若干年月。至少在东欧的一个卫星国，那些在1945年被没收的公司在1953年仍然作为一个机构在继续进行业务。有健全组织的公司的坚强和力量显然已被经验所完全证实，并引起了它们的最恶毒的敌人的注意。

企业家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老练的研究者却激动起来了；他晓得，所谓历史不外是那些由于某些奇怪的理由而呆在一起的人群——城市和国家，教会和政党，大学和俱乐部，民

族和帝國——的紀錄。這些單位的數目達到幾百萬，但若分門別類，或許只能分出一打左右的不同的類型。而這叫做公司的機構顯然是這些類型中數目相當少的類型之一，但決不是最不重要的一類。

四

上面是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明研究現代公司的必要性。但是除了增加對二十世紀這個突出的機構的了解之外，我們還有更廣泛的責任。如果我們的分析進行得正確，那我們除對公司有更多的認識外，將會了解：(1)所有權及其與權力的關係；(2)權力、它的習性和它的組成要素；(3)根據與其他權力組織——如國家——的關係以組織權力的機構。這樣分析的一個結果可能是：我們將重視在個人主義和民主社會中公司制度所必然要遭遇到的某些問題。

考查這些問題也許是和考查公司本身有同等的重要意義。這是屬於純粹政治理論的課題。它一直為人所漠視，主要原因是由於近年來政治學的純理論十分不引人注意。討論純理論問題是用不着請求原諒的，如果要是有所解釋的話，那最好是說明這個事實，即人們過去在這方面沒有做很多的工作。

從理論上說，現代公司似乎有權利受到比平常更多的重視。公司活動帶來的危險同樣要求我們對它加以嚴肅的注意。公司繼續發展的可能性，就我們所能觀察到的來說，是無限的。事實上它是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的一个制度，它可能成為社會的優秀工具之一，也可以成為十分專橫的機構。它值得社會人士和學者們加以注意。

五

二十世紀革命的主要輪廓目前才開始慢慢露出一點眉目。從1917年到現在的俄國革命的戲劇，及其鄰國中繼起的共產主義革